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丝路历史语言与吐火罗学论稿

徐文堪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丝路历史语言与吐火罗学论稿

徐文堪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丝路历史语言与吐火罗学论稿 / 徐文堪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12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 柴剑虹, 张涌泉, 刘进宝主编.)

ISBN 978-7-308-17625-5

I. ①丝… II. ①徐… III. ①丝绸之路-语言学史-文集②吐火罗语-文集 IV. ①H0-09②H211.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4914 号

丝路历史语言与吐火罗学论稿

徐文堪 著

出品人	鲁东明
总编辑	袁亚春
丛书策划	黄宝忠 宋旭华
责任编辑	胡 畔 (llpp_lp@163.com)
责任校对	宋旭华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6.75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625-5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浙江大学文科高水平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资助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柴剑虹 张涌泉 刘进宝（执行）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惠民 卢向前 冯培红 许建平 刘进宝* 刘 波

张先堂 张涌泉 赵声良 施新荣 柴剑虹

（加*者是本册责任编委）

总 序

浙江,我国“自古繁华”的“东南形胜”之区,名闻遐迩的中国丝绸故乡;敦煌,从汉武帝时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便成为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世界四大文明交融的“大都会”。自唐代始,浙江又因丝绸经海上运输日本,成为海上丝路的起点之一。浙江与敦煌、浙江与丝绸之路因丝绸结缘,更由于近代一大批浙江学人对敦煌文化与丝绸之路的研究、传播、弘扬而令学界瞩目。

近代浙江,文化繁荣昌盛,学术底蕴深厚,在时代进步的大潮流中,涌现出众多追求旧学新知、西学中用的“弄潮儿”。20世纪初因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流散而兴起的“敦煌学”,成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中国学者首先“预流”者,即是浙江的罗振玉与王国维。两位国学大师“导夫先路”,几代浙江学人(包括浙江籍及在浙工作生活者)奋随其后,薪火相传,从赵万里、姜亮夫、夏鼐、张其昀、常书鸿等前辈大家,到王仲荦、潘絮兹、蒋礼鸿、王伯敏、常沙娜、樊锦诗、郭在贻、项楚、黄时鉴、施萍婷、齐陈骏、黄永武、朱雷等著名专家,再到徐文堪、柴剑虹、卢向前、吴丽娱、张涌泉、王勇、黄征、刘进宝、赵丰、王惠民、许建平以及冯培红、余欣、窦怀永等一批更年轻的研究者,既有共同的学术追求,也有各自的学术传承与治学品格,在不

同的分支学科园地辛勤耕耘,为国际“显学”敦煌学的发展与丝路文化的发扬光大作出了巨大贡献。浙江的丝绸之路、敦煌学研究者,成为国际敦煌学与丝路文化研究领域举世瞩目的富有生命力的学术群体。这在近代中国的学术史上,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始创于 1897 年的浙江大学,不仅是浙江百年人文之渊藪,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英才辈出的名校。其百年一贯的求是精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脚踏实地而又敢于创新的学者专家。即以上述研治敦煌学与丝路文化的浙江学人而言,不仅相当一部分人的学习、工作与浙江大学关系紧密,而且每每成为浙江大学和全国乃至国外其他高校、研究机构连结之纽带、桥梁。如姜亮夫教授创办的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原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1983 年受教育部委托,即在全国率先举办敦煌学讲习班,培养了一批敦煌学研究骨干;本校三代学者对敦煌写本语言文字的研究及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在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浙江大学与敦煌研究院精诚合作,在运用当代信息技术为敦煌石窟艺术的鉴赏、保护、修复、研究及再创造上,不断攻坚克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拓展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原语言文学分会基础上成立的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也已经成为与甘肃敦煌学学会、新疆吐鲁番学会鼎足而立的重要学术平台。由浙大学者参与主编,同浙江图书馆、浙江教育出版社合作编撰的《浙藏敦煌文献》于 21 世纪伊始出版,则在国内散藏敦煌写本的整理出版中起到了领跑与促进的作用。浙江学者倡导的中日韩“书籍之路”研究,大大丰富了海上丝路的文化内涵,也拓展了丝路文化研究的视野。位于西子湖畔的中国丝绸博物

馆,则因其独特的丝绸文物考析及工艺史、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优势,并以它与国内外众多高校及收藏、研究机构进行实质性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而享誉学界。

现在,我国正处于实施“一带一路”伟大战略的起步阶段,加大研究、传播丝绸之路、敦煌文化的力度是其中的应有之义。这对于今天的浙江学人和浙江大学而言,是在原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基础上如何进一步传承、发扬学术优势的问题,也是以更开阔的胸怀与长远的眼光承担的系统工程,而决非“应景”、“赶时髦”之举。近期,浙江大学创建“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举办“丝路文明传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迈出的坚实步伐。现在,浙江大学组织出版这一套学术书系,正是为了珍惜与把握历史机遇,更好地回顾浙江学人的丝绸之路、敦煌学研究历程,奉献资料,追本溯源,检阅成果,总结经验,推进交流,加强互鉴,认清历史使命,展现灿烂前景。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编委会

2015年9月3日

出版说明

本书系所选辑的论著写作时间跨度较长,涉及学科范围较广,引述历史典籍版本较复杂,作者行文风格各异,部分著作人亦已去世,依照尊重历史、尊敬作者、遵循学术规范、倡导文化多元化的原则,经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协商,书系编委会对本书系的文字编辑加工处理特做以下说明:

一、因内容需要,书系中若干卷采用繁体字排印;简体字各卷中某些引文为避免产生歧义或诠释之必需,保留个别繁体字、异体字。

二、编辑在审读加工中,只对原著中明确的讹误错漏做改动补正,对具有时代风貌、作者遣词造句习惯等特征的文句,一律不改,包括原有一些历史地名、族名等称呼,只要不存在原则性错误,一般不予改动。

三、对著作中引述的历史典籍或他人著作原文,只要所注版本出处明确,核对无误,原则上不比照其他版本做文字改动。原著没有注明版本出处的,根据学术规范要求请作者或选编者尽量予以补注。

四、对著作中涉及的敦煌、吐鲁番所出古写本,一般均改用通行的规范简体字或繁体字,如因论述需要,也适当保留了

一些原写本中的通假字、俗写字、异体字、借字等。

五、对著作中涉及的书名、地名、敦煌吐鲁番写本编号、石窟名称与序次、研究机构名称及人名,原则上要求全卷统一,因撰著年代不同或需要体现时代特色或学术变迁的,可括注说明;无法做到全卷统一的则要求做到全篇一致。

书系编委会

前 言

徐文堪

承《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编委会柴剑虹、刘进宝、张涌泉诸位先生盛意，邀笔者编一本自选文集，收入《书系》。笔者考虑再三，颇为惶恐。我的本业是辞书编纂，西域研究和古代中外关系史等等，都属业余爱好，因而自感在相关领域造诣不深，少有建树，实不敢言“著述”。不过将近 20 年写的部分小文汇集起来，或许尚能供读者参考，也可以从中发现笔者治学的不足与缺陷，以便向专家和通人请教。于是，将已刊和刊印中的论文、书评等 30 篇集合起来，略加修改，基本保持原貌（其中有一篇是英文），只对体例等略加统一，编次成书。另有 3 篇，是属于编译性质的论文，作为附录收入，共计 33 篇。希望这些文章能大致反映笔者目前的学术观点和水平。

西域和丝路研究包涵范围极为广泛，古代中外交通也是国内外学者百余年来探索不止的重大课题，随着研究的深入、新材料的发现以及跨学科探索的开展，学术界对这些领域，已有了不少新的认识。以下根据我的个人体会，择其要点，略作简要说明。

首先是关于现代人的起源问题。西域的居民从何而来，这就涉及了现代人的起源。经过近 20 年的持续研究，现已证明出自非洲的假设是能够成立的。非洲起源说日益得到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古人类学和考古学证据的支持，但其与“多地区起源说”的争论并未终结，这是因为现代人类的起源和迁徙过程非常复杂，远远超出之前的想象。近年来相关的新发现层出不穷，也为研究

带来了新的难题,这些都有待我们去继续破解。

2004年,印度尼西亚弗罗勒斯岛发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古人类化石^①,这种人身材矮小,身高不足1米,脑量只有380毫升,在岛上生存到一万数千年之前。这些小矮人是直立人后代在岛屿环境中矮化形成的,还是现代人的病态现象,抑或属于一个古人类新种,目前仍存在巨大的争议。最近,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的马克·科拉尔德(Mark Collard)教授等发表论文^②,认为弗罗勒斯人是从非洲迁移至东南亚的矮小的前直立人后代,与能人(*Homo habilis*)最为接近。

丹尼索瓦人(Denisova Hominin)是在2008年于西伯利亚南部阿尔泰山丹尼索瓦洞穴中发现的。这一发现有极其重大的科学意义,因为根据DNA测序,丹尼索瓦人既非现代人,也不属于尼安德特人,而可能是更新世晚期生活在亚洲大陆的前所未知的古代人属^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菲律宾及其附近岛屿的土著居民的基因组中有一部分与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相似^④,这揭示了早期人类相互“混血”的历史。

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曾经认为:尼安德特人在遗传上与现代人祖先相去甚远,彼此之间不存在基因交流。但根据2009年、2010年以来的研究,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之间有基因交流,尼人

① P. Brown. et al. "A new small-bodied Hominin from the late Pleistocene of Flores, Indonesia", *Nature*, 2004, 431: 1055-1061.

② Mana Dambo. et al. "Bayesian analysis of a morphological supermatrix sheds light on controversial fossil hominin relationship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Published 22 July 2015. DOI: 10.1098/rspb. 2015. 0943.

③ T. A. Brown, "Stranger from Siberia", *Nature*, 2010, 464: 838-839.

④ D. Reich. et al. "Denisova Admixture and the First Modern Human Dispersals into Southeast Asia and Oceani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2011, 89: 516-528.

对现代人基因也有贡献。201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与德、美、罗马尼亚学者合作发表论文^①,对出土于罗马尼亚的约39000—41000年前的现代人古DNA进行检测,发现这个欧洲个体含有6%~9%左右的尼安德特人基因,这一数量超出目前任何已知的早期现代人基因组合,且该个体的四至六代祖先中存在尼安德特人。这一发现进一步证明:生存在四十至八十万年前、约三万年前灭绝的尼安德特人,虽然最终被现代人所取代,但他们的基因还是很有可能流传了下来。

其次是对丝绸之路和古代中外关系的研究,这同样是当前学术界的热点问题,我们应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开拓。“丝路”(Seidenstrasse)一词,是由德国地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23—1905)首创的。这个词产生的依据,正如王冀青先生所指出^②,是生活在埃及的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 约90—168年)于公元150年左右撰写的《地理志》。书中记录推罗的马利奴斯(Marinus)提到通往塞里斯(Seres)国(丝国)的道路,“丝路”一词正是由此而来。英国东方学家亨利·裕尔(Henry Yule, 1820—1889)所著《东域纪程录丛》(*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 of China*, I—II,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866),则奠定了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基础。

一百余年来,国内外对于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现在,我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已经突破了原来的局限。

^① Qiaomei Fu, et al. “An early modern human from Romania with a recent Neanderthal ancestor”, *Nature*, Published 22 June 2015. DOI: 10.1038/nature14558.

^② 王冀青:《关于“丝绸之路”一词的词源》,载《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2期,第21—26页。

我们现已确知,早在史前时代,东起西伯利亚东部和蒙古高原,西至西亚乃至欧洲,存在一条古老的草原通道。通道的东端经蒙古高原,向南沿着黄河、桑干河、永定河等,可以直达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地带——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一通道上多个地区的居民,都是游牧族群,对于游牧文化的综合性研究,就变得越发重要。

2001年以来,西北大学的学术团队对以哈密为中心的东天山地区展开了考古调查^①。经过15年,创立了古代游牧民族聚落考古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提出了对古代游牧民族聚落遗存基本要素的居住遗迹、墓葬和岩画进行“三位一体”综合研究的方法,极大地丰富了古代游牧文化研究的内容。

第三是吐火罗学。吐火罗学算是笔者数十年所关注的课题,近年以来,对吐火罗语和说吐火罗语族群的起源问题,学界有很大的进展,本书收录了几篇相关的文章。

现存吐火罗语A文书约2000件,时代为7世纪;吐火罗语B文书约10000件,时代约为5至10世纪以后。文书数量虽然看上去不少,但大部分都很短小或残破。此外还有石窟壁画的榜题、粗刻和木简等。关于吐火罗语的命名问题,经过百余年争论,至今没有完全解决,但根据近20年的新研究,吐火罗语A可以称为“焉耆语”,吐火罗语B可以称为“龟兹语”,这已经基本得到肯定,尽管“吐火罗语”这一名称似乎仍可保留^②。焉耆语文献主要出土于焉耆地区,也有一些出土于吐鲁番地区,其他地区几乎没有;现有材料没有反映出语言与字体的明显变化,而且字体在年

① 王瑟:《遗落在东天山的千年之谜》,载《光明日报》2015年8月4日。

② H. Ogihara(荻原裕敏),“Fragments of Secular Documents in Tocharian A”, *Tochar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 15, 2014, 103-129.

代分类上属于较晚阶段。龟兹语的使用则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其语音、语法、构词法以至书写字体等诸方面有从早期到晚期的变化,证实了德国学者斯坦普(Peter Stumpf, 1940—1977)对吐火罗语时代分期的看法是正确的^①。近十年的吐火罗语研究,已经体现出传统语文学和现代语言学的结合,这是非常有意义的^②。

过去一般认为:回鹘语《弥勒会见记》题记中的 *Tohri* 与希腊语的 *Tocharoi*、拉丁语的 *Tochari* 以及梵语的 *Tukhāra* 可以勘同,位置是在今天的阿富汗^③。现在多数学者都已认同 *tohri* 一词与古突厥碑铭中粟特语的“四 *Tuγri*”有关,应该在焉耆一带^④。根据汉文史料记载,月氏曾西移至巴克特里亚(阿富汗)。如此看来,月氏这一族群与历史上位于阿富汗的吐火罗族群之间有联系,但现在尚没有证据证明他们说吐火罗语。现今发现的巴克特里亚语属伊朗语,不过吐火罗语中确实存在来自伊朗语(巴克特里亚语)的成分,表明两者间有语言接触^⑤,这一点已引起学者重视。

吐火罗语(焉耆——龟兹语)是一种属印欧语西支的语言,尽管它在印欧语系中处于何种地位,至今尚无结论。正因如此,

① Peter Stumpf, *Die Erscheinungsformen des Westtocharischen*, volume 2 of *Tochar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 Supplementary Series*. Reykjavík, 1990.

② M. Peyrot, “Tocharian Language”, *Encyclopaedia Iranica*, online edition, 2015.

③ F. W. K. Müller, “Maitrisimit und Tocharisch”, *SPAW*, Berlin, 1916, 395–417.

④ Y. Yoshida(吉田豊), “Karabalgasunii. The inscription”, in *Encyclopaedia Iranica* XV, 2011, 530–533.

⑤ G. -J. Pinault, “Tocharian and Indo-Iranian: Relations between two Linguistic Areas”, In N. Sims-Williams, ed., *Indo-Iranian Languages and Peoples*, London, 2002, 243–284.

研究它的起源问题应与印欧语系及操该语系语言居民的起源和迁徙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现在学界一般认为南西伯利亚的阿凡纳湊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与原始吐火罗人有联系,而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的切木尔切克文化与新疆史前居民的关系同样值得关注。前述新疆巴里坤县的东黑沟遗址,国内一般认为与匈奴战胜月氏的记载相吻合,故被称为月氏与匈奴的古代家园。但该文化内涵与DNA检测结果,与被认为与吐火罗人有关、距今约四千年的小河—古墓沟文化明显不同。月氏能否等同吐火罗,两者联系究竟如何,目前没有定论。

总之,“吐火罗”问题至今仍是千古悬案,有待考古学、分子人类学和语言学界的通力合作,步步深入,方能逐步解决。

本书有一篇文章是概述和讨论印欧语及印欧人的起源和迁徙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学术意义重大,对解决“吐火罗问题”也极富启发性。

关于印欧语的“故乡”和印欧诸语言在欧亚大陆的扩散问题,已经有几个时代的学者进行了反复研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学者曾认为印欧语起源于北海附近。之后金布塔斯(Maria Gimbutas)及其追随者则提出应该在黑海北岸或更靠东的欧亚大陆中部伏尔加——乌拉尔地区,这即是所谓的“草原假设”。本书中有关吐火罗语各篇和《何处是故乡》一文,对此已做详细解释。大约40年前,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伦福儒(C. Renfrew)和苏联语言学家加姆克列利泽(Th. V. Gamkrelidze,现在是格鲁吉亚科学院院长)、伊凡诺夫(Vyach. V. Ivanov)主张印欧语起源于近东的北部地区(叙利亚东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进入21世纪,有几项新的研究支持印欧语发源于约9000年前的安纳托里亚(在今土耳其),说原始印欧语的印欧人随着农业的扩散而扩展。

在 2014—2015 年,两项新的研究引起了全世界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一项研究主要是遗传学方面的(中国学者付巧妹也参与其中)^①,研究团队对 8000 至 3000 年前的 69 个欧洲人个体进行了基因组检测,并对以前已发表的 25 组古 DNA 数据做了分析,证实 6000 至 5000 年前的俄罗斯颜那亚(Yamnaya)草原是欧洲印欧语居民的起源地,约 4500 年前的绳纹陶文化居民亦源于颜那亚文化,从而对印欧语的“草原起源”假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另一项研究是由伯克利加州大学的语言学家 Will Chang 等进行^②,他们对已灭绝和现存的 150 种印欧语的 207 组数据进行分析,基于被分析语言词汇的变化速率,构建新的印欧语谱系树,从而确定印欧语起源于约 6500 年前,从摩尔多瓦延伸到哈萨克斯坦西部的广阔草原地带。两项研究获得了考古学家安东尼(D. W. Anthony)和语言学家伦治(D. Ringe)的支持^③。

印欧语和印欧人起源问题是 20 世纪考古学、语言学和生物人类学遗留下来的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草原假设”并非最终结论,而是一个让我们更加深入研究和探索的新起点。

对于语言和基因的关系、语言的起源和演化语言学的进展等问题,本书也略有涉及,但并未深入探究。关于近年来的新进展,

① W. Haak, I. Lazaridis, et al., Massive migration from the steppe was a source for Indo-European language in European, *Nature* 522(7555), 2015, 207-211.

② Will Chang, Andrew Garrett, et al., Ancestry-constrained phylogenetic analysis supports the Indo-European steppe hypothesis, *Language*, 91.1, 2015, 194-244.

③ D. W. Anthony, D. Ringe, The Indo-European homeland from linguistic and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Annual Review of Linguistics*, 1.1, 2015, 199-219.